

CANG LIANG DE LI SHI



黄国柱 著

苍凉的历史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苍凉的历史

黄国柱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一二〇一工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

*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8.5·字数189,000

1990年7月第1版·1990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ISBN 7-5033-0140-6/1·119

定价: 3.70元

序

• 徐怀中 •

十年前，黄国柱同志还在大学中文系读书的时候，我们便有了书信的往来。他把他和同学们一起办的油印评论刊物寄给我，最早我就是从油印刊物上读到他的军事文学评论文章的。我发现这位军人大学生对中国和外国军事文学均有深入的了解，我曾写信向他问及苏联战争小说发展的情况，他给了我满意的回答。以后他到北京工作，我们交谈的机会就多了，他往往对军事文学创作的现状有自己独特的看法，给我颇多启发。

国柱是“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制度之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入学前已经有六、七年的部队生活经历，毕业之后又回到部队工作。和他有类似经历的一批大学毕业生加入军事文学队伍的行列，他们接受过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和文学史的教育，以及较好的专业训练，眼界比较开阔，思想也比较活跃，所以很快就形成了一支颇为可观的军事文学评论的力量。他们和军队的老中青作家们一道，为繁荣军事文学创作，推进当代军事文学研究的深入做了许多很有意义的事情。前两年，有关报刊开辟“当代军事文学系列评论”专

栏，就是以他们这一批评论作者为主干，发表了一系列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文章，受到军内外文学界的好评。我一向认为，文学评论应该有相对的独立性，有自己独立的品格，才能和创作相得益彰、共同前进。能够联合起一支有一定学术水平的评论队伍，实在是很有意义的大好事。这也是近几年来我们军队文艺队伍成分素质发生变化，水平不断有所提高的必然结果。而象黄国柱这样一批素质较高而又富于朝气的青年评论家的涌现和迅速趋向成熟，表明这一支群体力量必将对我国军事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收在这本评论集中的文章，我陆陆续续地读到一些，总的印象，他总是在力图表达自己对军事文学的独特见解的。这一点，和他另一本已经出版的集子《困惑与选择：现实主义面临挑战》是一致的。这本书侧重反映他对革命历史及战争题材创作的观察思考，是很有见地的。比如，关于“历史真实”和历史描写中的分寸感、艺术形式的关系问题；关于历史的神韵、幽默感的问题；以革命历史为题材的作家的使命感和科学性的问题；军事文学的理想境界等等，都进行了一些理论上的分析。值得指出的是，国柱同志对于军事文学理论的研究总是紧密联系创作实际的，他往往能够依据创作现状和存在的倾向性问题，坦诚发表自己的看法。无论是对创作还是对评论自身，他都敢于提出一些深入剖析和批评性的意见，体现了一个评论工作者应有的品格。近几年来文艺评论相当活跃，军队的文艺评论也比以前有很大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自己的声音，没有自己的特色，没有深入细致的研究思考，就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在这个问题上，国柱是清醒的，是做出了认真努力的。

从这个集子里可以看出，作者对军事文学几年来的发

展态势，军事文学的作家作品的情况是很熟悉的。所以他能够写出象年度性述评那样的文章，也能写出宏观上鸟瞰式的文章，还写了不少作家作品的专论文章。这些文章有着自己的鲜明的风格特色。他的一位同龄的同行张志忠曾在一篇文章指出，国柱的文章有很强的可读性，行文流畅，较有文采，也比较讲究逻辑性和知识性。我觉得这样评价黄国柱的文字还是准确的。就个性而言，黄国柱比较内向和细心，而文学理论和评论是来不得粗枝大叶，大而化之的，也许正是性格上的这个特点，帮助他把文章写得入情入理而又并不隐讳自己的观点。

和军队的其它评论作者不同的是，黄国柱是兼编辑、记者和评论作者于一身的。这使他有开阔的视野，掌握着较大的信息量，交了许多作家朋友。繁忙的业务工作占用了他大量时间，但也使他拥有其它人所难以获得的优势。当然，写作对于他来说决非一件很轻松的事情，他作为军事文学评论圈子里一名活跃分子，短短几年里完成了相当大的工作量和写作量，几乎全是用的业余时间，这本书里的文章也不例外。不管一个人曾受过什么样的教育，拥有什么样的好条件，如果自己不刻苦努力，也还难免是一事无成。这是一个很朴素的道理，从国柱身上又一次得到了印证。当然，从更高的标准看，许多方面他还要做出努力的，尤其是理论上系统的建树，对国柱来说还是一个远期目标，尽管我们不怀疑他会有信心和勇气去做不懈的追求。

1989年8月北京

目 次

序	徐怀中 (1)
历史风尘的文学多棱镜	(1)
战争文学概览	(20)
“历史真实”驳议	(31)
平淡的战争	(39)
历史的幽默	(47)
连接历史和现实的悲剧意识	(53)
寻觅历史生命的魂魄	(57)
苍凉的历史	(63)
开国群雄唱大风	(67)
军事文学的理想境界四题	(72)
中国的“尚武精神”二题	(84)
文学批评的困顿和生机	(90)
期待更真切的批评	(94)
文坛论争的喜与忧	(97)
面对报告文学的崛起	(101)
从对《红高粱》的褒贬说起	(105)
也谈人性描写的问题	(107)
“骚”的价值	(111)

两峰并峙 双水分流·····	(114)
1986: 寻找自己的艰难跋涉·····	(117)
1987: 军事文学鸟瞰·····	(128)
1988: 徬徨在峡谷·····	(132)
“莫言神话”·····	(138)
闪光的“轶事”·····	(150)
现实主义的勇气和力量·····	(154)
都是军旅生涯过来人·····	(158)
发掘较大的思想深度·····	(167)
军旅诗的主旋律和多样化·····	(171)
军事文学的艺术形式探索·····	(176)
敢问路在何方·····	(182)
《中国体育界》: 面对变革的时代大潮·····	(188)
大气磅礴的改革壮歌·····	(196)
开掘革命战争历史的富矿·····	(200)
军旅: 永恒的幽默·····	(203)
相撞的都是年轻的心·····	(207)
大漠风情大漠魂·····	(211)
军事文学地域特色的追求与超越·····	(216)
军队话剧艺术的新课题·····	(224)
美国战争文学中的道德选择·····	(230)
关于《一个人的遭遇》·····	(241)
战争文学的道德审视·····	(254)
后 记·····	(266)

历史风尘的文学多棱镜

在新时期汹涌澎湃的军事文学大潮中，历史，包括革命战争历史的文学，一直是十分引人瞩目的一个分支。随着“四人帮”的覆没，对十年浩劫，对文革前十七年，对革命战争，对五四运动，对辛亥革命，对戊戌变法，对洋务运动，对晚清明末……对整个中国文明史、文化史的伟大的反思终于揭开了沉甸甸的序幕。

军队老一辈的作家们获得了新的视角，去重新审视他们所经历过的革命战争；中青年的作家面对浩如烟海、风云莫测的历史，尽管还缺乏足够的准备，但是时代的召唤，已经等不及让他们去苦读寒窗、面壁十年，他们必须投入深不可测的历史暗河之中，寻找失去的真切的历史的灵魂，为那些淹没多年的历史冤案补唱一支悲壮的安魂曲。在探索和思考的大胆方面，也许他们常常要冒犯我们严谨而缜密的历史学家的尊严。正如我的这篇论文一样，不时会闯进我们并不很熟悉的历史学的领域，冒着非学术化的危险去谈论历史哲学的问题。我相信，对于我国古代“文史哲”不分家的传统的回归，并非出自某一两个初生牛犊的探索的勇气，而是时代精神所使然。著名的当代英国政治家温斯顿·邱吉尔说过：“创造历史的最好办法是写历史。”这句话无论对于政治家、军事

家、史学家、文学家、诗人都是通用的。它意味着，不同职业分工的人，都将用自己独特的手段或方式去创造自己心目中的历史。为了更清晰地勾画当代军事文学对于历史描述和思考的轮廓和我本人对于文学中历史表现的哲学的和审美的认知，我们不得不从一些基本的问题或概念入手，来开始我们的讨论。

历史是什么

正如“文学是什么”、“艺术是什么”、“政治是什么”、“人是什么”……等等一系列看上去很简单，但回答起来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问题一样，当我们面对文学和历史的关系、实际上也就是面对了历史理论中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历史是什么？”的时候，同样会遇到许多种不同的答案。

如果用最简略的语言来回答，那么迄今为止东西方的先贤前哲们已经做出了许多答案：1.历史是人类的全部过去；2.历史是过去的(事情)；3.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4.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5.历史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6.历史是人类的过去的知识；7.历史是对过去(事情)的陈述；8.历史是记录或未记录下来的对人类往昔经验的记忆；等等。

当我们认真思考这些定义时会发现，如果执于一端，很容易陷入“什么也不能说明”的窘境。因为杰出的历史学家们都从自己所寻求的那个角度出发来考虑和说明“历史是什么”的问题。如果用这种方法来排列，那么一千个历史学家大概会有一千种定义。那是因为判断历史会有无数种角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判断者所持有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其特定的世界观方法论出发，得出了迄今为止的一切文

明史都是阶级斗争史的结论。当然，马克思还有另外的说法，他认为，历史既是服从一定规律的自然过程，又是人类自己写作和上演的全人类戏剧。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强调历史学家不仅应当记载按年代顺序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而且应当从理论上对这些事件进行解释，为此目的，就应当使用一整套成熟的概念。另一方面，他们又明确地宣告，“这些抽象……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和公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1页）总之，马克思从不否认历史过程或历史认识的特殊性质。他曾经写道：

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无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页）

马克思的出发点是人，因此得出了自己的历史定义。马克思所说的人，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因此，对于历史的理解，首先可以认为是现实人关于过去，特别是人类过去的认识。一切历史都是现时代人的一种特有的思想活动。其次，一切历史都是当代的，现实人的历史，都是思想、知识、自我意识、智慧的结晶。

在这里，我们会碰到至少两个悖论：一、前人的历史和真正的全部“过去”在本体论的意义上是不可知的；但在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意义上又是可知的。二、历史包容了所有人类的思想精神，物质生活的活动，理所当然的包括了文学。文学在历史之中；但同时，文学又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感知、感

悟、描述历史，文学又在历史之外。每一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无论他是历史学家，还是文学家，都会执迷于这两对无法解脱的矛盾悖论之中。正是这种执迷，这种对“过去”——“历史”的信仰崇拜，使他们有可能用各自的笔描绘出、编织出丰富多采、斑斓缤纷的人类生活的图画。

于是，“历史到底是什么”的问题仿佛变得不那么至关重要了。重要的是如何描绘它。因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史学家，文学家同样可以大显身手了！

我们为什么需要描绘历史

在我看来，历史是介于文学、科学、哲学之间的一门学问。我国古代著名的《史记》早已提供了这个判断的雄辩的论据。十九世纪英国历史学家麦考莱也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历史，在它圆满理想的境界，至少是一种诗和哲学的合成产品，它通过特定人物和特定事件的生动描述将一般真象印入人心。”（《世界历史》1981年第4期）当然，作为历史学家，麦考莱在这里更多强调的是历史的实践功能，而不是它的审美价值。但是，认为历史的描述不仅仅是资料的堆砌，而应当是人类自我积累、自我完善的一种高层次的精神追求，这却是东西方各民族都能够接受的认识。于是，仅仅有历史学家就远远不够了，各民族都在历史学家们缜密考证研究的同时，造就了一大批以描绘历史为己任的诗人和文学家。客观地说，人类最早期的历史得以保存下来流传至今，更多地不是依赖于历史学而是依赖于文学。无论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印度的《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古代日耳曼民族的

《希尔德布兰特之歌》、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大和民族的《源氏物语》、藏民族的《格萨尔王》、汉民族的《诗经》、羿射九日、女娲补天……各民族最早的历史都能够在史诗或神话传说中找到生动的描述和解释。

从世界各文明诞生那天起，人类便开始寻求人类自身的历史的终极奥秘，从而形成了各种不同民族不同时期文化对历史的迥然不同的描绘方式。比如古典文化是阿波罗型的，它注重现在，泰然地忘怀一切内心的和外在的过去；西方文化是浮士德型的，它无休止地追求自我完善，追求无限，而不满足于现在。中国的文化对于历史和“先王列祖”的尊重，几乎是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是无法比拟的，以至于孔子在数千年前就提出了“克己复礼”的复古主义要求。以悲观主义而著称于世的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认为，因为每种文化都是独特的，而人只能站在自己的文化中看待一切，所以要在不同文化之间加以沟通、相互了解是不可能的。他说：“两种不同文化的人，各自存在于自己精神的孤寂之中，被一条不可逾越的深渊隔开了。虽然印度人和中国人在那些日子里都自觉是佛教徒，他们在精神上依旧离得很远。相同的经文，相同的教义，相同的信条——但是两种不同的心灵，各走自己的路。”（《西方的没落》153页）

如果说，斯宾格勒关于历史和文化的奥秘或者说终极秘密是人的理性和抽象思维所无法接近的宿命论观点我们无法全盘接受，那么，他的关于各民族文化之间的难以沟通的观点却是相当有道理的。在一种相对封闭的文化体系之内，一切历史文化知识的传播都有自己相对独特的方式。在文盲和识字不多者占了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历史上，文学而不是史学著作成了传播历史知识的最普遍的媒介。历代特别是近现

代的历史学家都明白，欲达到宣传历史包括自己的历史观的目的，必须采用文学艺术的手段。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广为人知，并不在于他明史研究的专著，而在于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郭沫若把诗人剧作家和历史学家很融洽地统一于一身，并用《蔡文姬》、《棠棣之花》、《屈原》等历史剧来张扬自己诸如“替曹操翻案”的大胆观点，以抵消传统的历史文学作品《三国演义》中所宣扬的种种封建正统的伦理道德观点。当然，郭沫若面对强大的历史文学的传统，单枪匹马，力量有限。但这段佳话却告诉了我们文学和历史之不可解脱的姻缘。尤其在我们这样一个史传文学特别发达的国家里，在历史的领域里，永远有文学的一席不可或缺的领地。

历史的记载已经足够汗牛充栋，为什么后来的历史学家、文学家还是要执迷于自己的描述呢？还是用英国哲学家、史学家沃尔什的话来回答吧：“历史之光并不投射在‘客观的，事件上，而是投射在写历史的人身上，历史照亮的不是过去，而是现在。毫无疑问，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代人都觉得有必要重写他们的历史的缘故。”（《历史哲学导论》第111页）直白地说，历史之树的根须是深扎于现实之中的，也可以说人们对于历史的兴趣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现实的需要。

说到“现实的需要”，人们很容易联想到四人帮时期“古为今用”的阴谋文艺，以及那一幕幕“评法反儒”，“评《水浒》”荒唐的政治闹剧，因而进一步怀疑这种提法是否容易坠入“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的窘境而无以自拔。新时期以来史传文学的繁荣以及大量历史题材文艺作品的出现都表明，这种担心和怀疑是有道理的，但并非不可避免。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路并不是完全政治性的，很大程度上基于一种政治开明，史学家文学家可以各抒己见的前提。同时，还基于

意大利史学家哲学家克罗齐的这样一种论点：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个论断的获得并非是一种简单的为现实政治所用的功利口号，它是一种理性思考的产物：即认为，史实并非先已独立存在，而是经过人的思考，才显现出意义的，史实及其意义是在思想或精神活动中同时产生的，史实与意义结合在一起才构成一个历史判断。这判断不是关于个别事实的客观报道，而是思想活动的一个结果。换句话说，思想产生了历史，思想活动就是历史，此外别无历史。克罗齐认为精神活动，思想活动就是哲学，所以“历史即哲学”。针对当时“文献历史”的现状，克罗齐要求一个历史学家也同时是一个哲学家，而不单纯是一个文献搜集者。但是，历史与哲学的同一不是无条件的，只有“当历史被提升为关于永恒的现在的知识时”，历史才“表现为与哲学是一体的，哲学原不过是关于永恒的现在的思想而已。”（《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第43页）因此，结论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克罗齐看来，过去史与当代史并没有什么区别，“象当代史一样，它的存在条件是，它所叙述的事迹必须在历史家的心灵中回荡”。（同上第2页）同样，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过去的还是未来的历史学家，他们所思考所研究的历史总是和现在的生活有着某种密切关系的，“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才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因此这种过去的事实只要和现在生活的一种兴趣打成一片，它就不是针对一种过去的兴趣而是针对一种现在的兴趣的。”（同上）这无异于说，历史学家是按照现实生活所激发起来的兴趣去唤醒和复活过去的历史的。这样克罗齐的结论至少包涵了以下的涵义：第一，研究历史总是现时现刻的思想活动；第二，历史研究的兴趣来自于当代兴趣的激活；第三，对历史的理解和思考也离不开当代的精

神气韵。这三层意思都在强调历史与当代生活的统一，正是这种统一使过去的历史和浩如烟海的死的史料获得了活生生的当代性。我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肯定描述历史的“现实需要”的。这和这几年人们常说的“用当代眼光观照历史”颇为相似，从而从根本上和四人帮的唯我所用的“影射史学”“阴谋文艺”划清了界限。

如果我们是一个细心的读者，就不难发现，由于现实生活的“兴趣”的需要，历史能否获当代性，便具有相当大的选择性。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过去的历史都能获得当代性的，一个历史事件，一个历史人物的重现于当代，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多种因素撞击融合的结果。显然，《甲申三百年祭》之出现，和无产阶级即将夺取全国政权，急需历史教训有关；而近年来出现的钱钢的报告文学《海葬》，并非旨在拖出李鸿章和北洋水师来重新玩味，完全在于一种对当代中国及中国军队改革状况及其历史渊源的关注。因此，它们都获得巨大的成功和非凡的活力。简而言之，历史，以及历史描述的作用就是帮助人们去看清现实，因为现实本身就是由历史构成的。卓越的历史文学作家都具有深邃的当代现实眼光，只有这一点才能使其卓越。

既然历史不再是一片沉睡的墓地，那么它将不断获得当代人精神追求的微妙的楔机，从而成为永恒的当代人的对话者。英国历史学家卡尔说：“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历史是什么？》第28页）这样，不同的时代都会从新的角度来评价解释历史，同一件史实也会因为时代的变迁而获得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评价和描述。和克罗齐齐名的分析批判史学流派的科林伍德说得好：“历史学家不是单纯地

重演过去的思想,而是将其纳入自己的知识结构中来重演它,因此,重演它就是批判它,并对他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纠正他所能辨认出来的错误。”这样,我们就找到了另一条需要不断地描述历史的雄辩的理由,每一个生机勃勃的,变革的伟大时代,都是对前代历史重新评价,重新发掘,重新认识的时代。伟大的文艺复兴和18世纪的启蒙运动,无不是对古代采取了一种崭新的姿态而汲取一种积极进取的新的动力。

从这里,我们似乎不难找到新时期以来,革命历史战争文学空前活跃、历史文学空前繁荣的内在的原因。几乎所有在十年浩劫中被颠倒、被混淆的历史都获得了新的生命。不仅受冤屈的无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崭新的风貌再现于银幕、屏幕、舞台,中国几千年中无数的历史人物也风起云涌,再度出现在十年历史断层之后的新大陆上。批判的针芒所向,再一次体现了积极变革的时代精神气韵。在这里,我不想列举更多的篇目,只想列举以志愿军战俘为题材的两部纪实性作品为例,那就是靳大鹰的《志愿军战俘纪事》和于劲的《厄运》。这两部作品所描绘的题材几十年来一直是讳莫如深的。在一种不敢于面对失败,以“面子”重于一切的虚伪的传统文化中,志愿军战俘所遭受的精神和肉体的摧残是无法言传的。当社会的伦理价值取向走向多元的变革时代到来的时刻,我们的青年作家以“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敏锐,率先闯入了这个本应由严谨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伦理学家首先要介入的领域并取得了爆破性的成就,有力地促进了全社会社会主义人道精神的觉醒和反思。这两部作品本身存在着某些艺术上的差异,但是他们和后来出现的《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一样,都表述了一种强烈的批判精神,不是抄袭那些经过考订的最完善的史料,而是做出了自己的结论,以自己生气勃勃的创

见为变革的社会精神增添了活力。

文学对于历史的描述，其意义显然并不仅止于回答当代人的迫切的现实问题和精神家园的寻找，社会思想的批判性的促进机制，还在于总结历史经验对于人类未来前景的一种预测以及提供不再重蹈覆辙的教训。对过去的关注也就是对未来的关注，这个有一定程度限制的结论无疑是相当深刻的。在人类漫长的文明史中，一直经历着战争——和平，乱——治的悲惨的轮回，是否冥冥中有一种无法抵抗的力量在驱使着人类进行着宿命的旅程呢？我们信奉历史唯物主义的共产党人当然不会相信这种宗教的呓语。但是总结历史教训，避免相同的悲剧重演，无疑是每一个哲人和智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当我们读到军队作家徐志耕的《南京大屠杀》的时候，当我们读到东西方的许许多多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惨绝人寰的法西斯暴行的著作的时候，这种百年忧虑会沉重地笼罩在我们的心头。一般说来，人类前途命运的设计的主要任务并非由历史学家，更不是由文学家来完成，然而，他们显然可以为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家们的设计提供富于情感份量的资料，这种影响对于通向权力之路上的每一位青年人都会是巨大的，我们没有理由退缩，我们将尽最大的努力，完成历史的使命。

本来，关于为什么，或者说要不要描绘历史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无论我们的周围现状怎样的令人担忧，历史总是最好的导师和参照系。

我们怎样描绘历史

如果说对于前两个问题的回答，还具有史学、文学共同